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文库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 清学史著述之研究

(修订版)

李帆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文库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 清学史著述之研究

(修订版)

李帆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李帆著. —
修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11650-3

I. ①章… II. ①李… III. ①章太炎(1869~1936)—中
国历史—研究—清代 ②刘师培(1886~1919)—中国历史—
研究—清代 ③梁启超(1873~1929)—中国历史—研究—
清代 IV. ①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206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

(修订版)

李 帆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1650-3

2016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¼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绪论	1
一、缘起	1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检讨	5
三、研讨思路	29

上 篇

第一章 清末学术大势与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 清学史的研究视角	33
第一节 清末学术大势	33
一、中西交融之学的繁盛	33
二、经史位置的转换	36
三、学术史研究的勃兴	41
第二节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清学史的研究视角	46
一、基于自身学术渊源的研究	47
二、基于时代因素的研究	59
第二章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概观	68
第一节 时期与篇目	68
第二节 基本内容与主要特色	71
一、章太炎之清学史论	71

ii 目 录

二、刘师培之清学史论	79
三、梁启超之清学史论	89
第三章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论的分析与评价	99
第一节 重点论题评析	99
一、关于清代学术之来源	99
二、关于清代汉学之发展阶段	105
三、关于清学之地域、学派分野	110
第二节 学术史反思与评价	121
一、章、刘、梁清学史研究之简略比较	121
二、章、刘、梁清学史著述的学术地位及对民国学术界的影响	125

下 篇

第四章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与近代的戴学复兴	135
第一节 戴震学术在清代的际遇与章太炎、刘师培对其的 阐扬	135
一、清末以前戴震学术的际遇	135
二、章、刘对戴震之学的阐扬	138
第二节 梁启超与民国初期的戴震研究高潮	141
一、清末民初梁启超对戴学认识的转化	141
二、梁启超与戴震研究高潮的到来	143
第五章 考据之学：章、刘、梁对戴震及皖派学术的评析	147
第一节 吴、皖分际与褒皖抑吴	147
一、吴、皖之分际	147
二、褒皖抑吴的学术取向	152
第二节 考据学风与科学精神	162
一、科学视角的引入	162

二、戴氏考据学的“科学”性	164
第六章 义理之学:章、刘、梁对戴震思想的新阐发	172
第一节 不同视角下的戴震义理学	172
一、民族主义视角下的考察	172
二、哲学视角下的阐释	177
三、所谓“反理学的思想家”	181
第二节 戴震理欲论的评析	186
一、章太炎的评析	186
二、刘师培的评析	189
三、梁启超的评析	192
结束语	196
参考文献要目	199
附录一 学术史的若干省思	206
附录二 学术史研究的独特视野	
——李帆教授访谈录	李卫民 222
后记	245

绪 论

一、缘起

“学术”之于中国,有数千年历史,但“学术史”之出现,则晚至清初。梁启超曾指出:“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首创了“学案体”,按照学派详细分析并准确概括了特定时期儒学发展的历史,是真正以“人”为主叙述学术发展历程的第一部著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确为不易之论。^②

黄宗羲之后,学术史作为显学而勃兴是在清末民初。章太炎首开其端,在其 1899 年辑订的《馗书》初刻本中,便已有论述学术史的内容,1902 年删节修订《馗书》时,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 页。

② 有学者认为:“自《论六家要旨》以后,中国古代被称为‘学术史’的著作大抵有两类,一是目录,二是学案。”(葛兆光:《思想史与学术史》,《学人》第 1 辑,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国古代目录学家虽也讲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目录毕竟以对书的分类登录为主,缺乏对学术源流与脉络的精细分析,而且见物不见人,所以较完善的学术史似应从学案体创立算起。另外,梁启超也提及“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时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然在正史中仅为极微弱之附庸而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436 页)。真正的学术史应自《明儒学案》开始。

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容,此后又陆续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问世。紧随章太炎之后撰著学术史著作的是刘师培。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基本停止了学术活动,而刘师培恰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学术界,发表《近儒学案序》、《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等一系列学术史论著,成为当时在学术史领域发表论著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学者。刘师培之后,学术史领域成就最大且广为人知的学者为梁启超。梁氏虽早于1902年便开始陆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论著,但其最有影响的学术史著作当为进入民国后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刘、梁之外,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皮锡瑞、廖平等学术大家也都有学术史方面的论述,对清代学术所论尤多。另外国粹派学者亦普遍重视探讨中国学术史,《国粹学报》上屡有邓实、黄节、田北湖、陆绍明等人的这方面著述。

在学术史勃兴的这一潮流中,无论就著述的质与量,还是就著述的影响而言,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三人的成绩都是最显著、最有代表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人的学术史视野中,清代学术是被关注的重点,章太炎的《清儒》、《汉学论》、《释戴》等篇,刘师培的《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近儒学案序》等篇,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近世之学术》篇,特别是其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皆为阐发清学^①之作。这毫不奇怪,因为对他们而言,清学不仅属“本朝”史的范围,与现实息息相关,而且更重要的是,以他们为代

^① 所谓清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清学就是指的清代学术,狭义的清学目前尚无一致看法,有学者认为是相对宋学而言的,即清代汉学的简称。本书所言清学,取其广义。

表的这代学者是在清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无论每个人成长后的发展方向如何,都离不开清学这一丰厚的土壤。

清代学术涵盖领域甚广,举凡经学、史学、子学、小学、地理、金石、天文、历算等皆在其范围之内。但其特色为考据,考据学是有清一代的标志性学问。在这方面,学界公认惠栋、戴震是集大成者,正是他们开启了乾嘉考据之风,使考据学蔚为大观,成为清代之标志性学问。在惠、戴二人中,更有代表性的是戴震。虽然二人皆为一派之主,他们本人及其后学都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但戴震之学涉猎更广,已超越狭隘的考据樊篱,走向以考据求义理的宽阔领域,就像梁启超所言,戴震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所以戴氏的学术贡献、学术影响要更大一些,足以作为清代学者最杰出的代表而载入学术史。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皆极重视戴震学术,视其为研究与总结清学史的关键所在,阐之不遗余力。因此,循章、刘、梁之意,以戴震为研究个案,会收一叶知秋之效。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清代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中国古典学术演进至此,已是绚烂至极,在清代学者的进一步努力下,有了集大成的光辉成就;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季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挟其船坚炮利之优势,把一个与中国固有文明截然相异的文明强行输入中国,西学借此大举进入,与中国古典学术相遭遇,双方相激相荡,相通相融,促使中国学术在面貌上发生了根本改变,无可选择地走上了新途。这两种情形已然昭示,与其他时代相比,清代学术实具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对其加以系统梳理和总结,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显然至关重要。

在对清代学术的总结方面,清末民初的一代学人最有发言权,

因他们本系清学之子,自身学术从清学中衍生出来,对清学的利弊得失具有切身体验与感悟,同时又生逢清季西学涌入、中国古典学术衰微之际,最想从对有清三百年学术的回顾与总结中,获取更新学术的资源,从而使中国古典学术适应新的时代,走上向现代学术转化的道路。在这些热衷于清学史的人中,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的著述最多,也最具特色,不同的政治立场、思想体系与学派背景使得他们笔下的清代学术各呈千秋并各成体系,而且他们皆关注学术的当下情状,能把从清学中汲取的有助于学术更新的东西与西学新知相结合,贯彻于自身的学术实践,力图由此建立起中国现代学术。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是成功的。所以,以他们的著述为核心探讨清末民初的学术史尤其是清学史研究状况,不仅具有代表性,可由小见大,反映当时清学史研究的整体面貌;而且他们的特殊身份——转型中的学术大师,亦使得这种探讨体现出独特的深刻性与启示性,即一端系于中国古典学术,一端连着西学新知的这三人对清代学术的反思和总结,显然比不具此种身份之人的著述起点要高,因他们能既入其中又出其外,跳出庐山看清学的真面目,并能在此基础上为后世学术开出新路。戴震是清学的代表人物,在宏观论述的同时,选其为研讨的个案,是希望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与系统,避免泛泛而论。

在 21 世纪之初的今天,学术界又兴起一股回顾总结近百年中国学术史的潮流,并渐有成为显学之势,这与百年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关注于有清三百年学术史的总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实则两者都欲借学术史的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思和检讨自己走过的道路,从中获取前进的方向,以便中国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成熟地走向未来。考虑到这一层,探讨当年章太

炎、刘师培、梁启超为代表的清学史研究状况,无疑又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若将这两次学术史反思潮流加以比较,当能发掘出更多的学术资源。

此外还应提及,对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三人的研究已有较长久的历史,在深度、广度上均已取得较大成绩,但也并非无懈可击,某些领域还相当薄弱,尚待深入开掘,本书所要研究的课题便属这样一个领域。所以,出于进一步发展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研究以及完善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考虑,把章、刘、梁三人对清学史的总结纳入学术视野,做“学术史”的学术史,显然很有必要。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检讨

之所以说学术界对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的研究相当薄弱,并非指这方面一点成就也没有,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成果的稀少与该课题的重要性不成比例。由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这二十余年,相关研究有些起色,但在质量上,仍不尽如人意。

1. 1949年以前的研究状况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三人中,刘师培去世最早。在他刚刚去世的1920年,日本学者小岛祐马即发表了《刘师培之学》一文。^①这是第一篇关于刘师培学术的研究性论文,概述了刘氏学术的渊源及其国粹主义学术活动的主要方面,重点介绍了其经学建树,但对刘氏的清学史尤其清代经学史研究成就则忽略了。此

^① [日] 小岛祐马:《劉師培の學》,《藝文》第11年第5、7号,大正九年5月、7月;又见《中國の社會思想》,筑摩书房1967年版。

后直到1937年钱玄同编定《刘申叔先生遗书》并为之作序,才对刘氏含清学史在内的学术思想史著述有所评价,钱玄同认为“刘君对于学术思想,最能综贯群书,推十合一,故精义极多。……其推崇王阳明、王心斋及泰州学派诸杰,李卓吾、颜习斋及李恕谷、戴东原、章实斋、崔东壁、龚定盦、戴子高诸先生之学,尤为卓识”^①。除钱序外,这一时期关于刘师培之文仅数篇传记和事略,谈不上真正的研究。

对章太炎、梁启超的研究也基本在其去世之后,尽管此前亦有对二人的诸多议论,还出现了像《章太炎外纪》^②一类传记、事略之著,但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作极少,其中周予同对章太炎的评论值得注意。周氏认为,章氏“的确由俞樾方面接受汉学,以继承王引之、王念孙、段玉裁、戴震、顾炎武一派的学统;但同时他受浙东史学派的影响,兼承了章学诚、全祖望、万斯同、黄宗羲一派的学统。他是经古文学家,而同时是史学家”^③。

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他的生前友好及学生纷纷撰写纪念性质的文章与传略,对其一生作了较高评价,其中尤以郑振铎的《梁任公先生》、素痴(即张荫麟)的《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最具学术性,内有对其学术史著述的看法。如在评价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郑振铎认为:“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

①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排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第29页。按该书初版时,题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排印,实则编竣印行在此之后。

② 汪太冲:《章太炎外纪》,北京文史出版社1918年版。

③ 周予同:《康有为与章太炎》,节自《第四期之前夜》,原载《一般》第6卷第1号,1929年1月;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的一部著作发见过；她是这样简明扼要地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中国学术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系统地整理出来的书。虽有人说她是肤浅，是转贩他人之作，然作者的魄力与雄心已是十分的可敬了。”^①素痴也认为：“此实第一部有统系之中国学术史，一气呵成，前无凭借，非有绝伟之识力，其曷能与于斯？胡适自言其立志治中国思想史，实受先生此文之影响，则民国六、七年后‘新汉学’之兴起先生盖导其源矣。”^②对梁氏的《清代学术概论》，郑振铎认为是“对于清代学术的有系统的一篇长论，但多泛论，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的结果。独有对于康有为及他自己今文运动的批评，却是很足以耐人寻味的”^③。此外，出版虽晚但成书于梁氏逝世不久的《梁启超年谱长编》^④，可谓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梁启超研究著作，它以书信为主展示的谱主生平，提供了谱主从事学术史撰述的大量背景材料，十分有益于今之研究者。

1936年章太炎去世，他的亲友、弟子等纷纷撰写各类文章以示悼念，《制言》半月刊将9月出版的第25期作为“太炎先生纪念专号”，收录了这些文章，其中以庞俊《章先生学术述略》最有学术

①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原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1929年2月；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② 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原载《大公报》1929年2月11日；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06页。

③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85页。

④ 《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著开始于梁启超去世之后，1934年由丁文江、赵丰田编成第一稿，约100万字；1936年经赵丰田削减后编成第二稿，约67万字，定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台湾世界书局将第二稿稍加删节后出版；1978年冬，上海人民出版社请赵丰田再次修订，1983年以《梁启超年谱长编》之名出版。

色彩,对了解章氏学术最有裨益。文中言:“盖自清世诸儒,竞言治经,其成学著系统者,以戴氏为大师,先生少从俞德清游,故最服膺段王诸家,以上继戴氏之所为。”从《馥书》以至于《检论》皆“自成一言”,但“其早年持论,志在光复,或矫枉以救时,或权说以动众,若《诸子学略说》之属,譬之刍狗,用在一陈,本非定论也”^①。1937年6月章太炎逝世周年时,钱穆发表《余杭章氏学别记》,指出:“太炎早岁即慕亭林,其严种姓,重风俗,皆与亭林论学之旨相近。而其评论历代风俗人物进退得失之故,则颇有不与亭林同者,亦各据其世而为言也。……其评鹭诸家学术,亦可准此推。谓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亲民,不以干禄。”^②另外作为章氏弟子的许寿裳曾于1945年出版《章炳麟》一书^③,亦对章氏学术贡献多所涉略,但罗列多论断少,仅以叙述见长。就章氏对清学之看法而言,这几篇论著均未提出具体见解,真正注意到章氏包括清学史在内的学术史研究方面贡献的首推侯外庐。在1947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侯外庐指出,对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在太炎遗书中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按他关于周秦诸子、两汉经师、五朝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都有评论,即从他的著作中整理一部‘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亦颇有意义。实在讲来,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太炎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最反对满清统治的人,他最怕言致用有利于满清”,所以他对清

① 庞俊:《章先生学术述略》,《制言》第25期,1936年9月16日。

② 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天津《大公报》1937年6月10日;载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28页。

③ 许寿裳:《章炳麟》,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

代学者的评价,“首先是基于反满一点”;而且“他常赞草野出身的学者,颇有学术上的平民主义”^①。侯外庐的这类论断,为后人提供了诸多启示,开启了章太炎研究的新路径。

2.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研究状况

从 1949 年到“文革”结束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这 30 年里,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大陆学者们对章太炎、梁启超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对刘师培的研究则基本付诸阙如。与此同时,台湾和国外学者也有一些成果问世,论题相对宽泛一些。

章太炎研究。“文革”前大陆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其思想,尤重其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成果虽较丰富,但思路相对狭隘。“文革”期间“四人帮”出于政治需要大搞评法批儒,将章太炎定为法家,加以随意渲染,造成对学术的严重扭曲。“文革”后,唐振常发表《论章太炎》^②,对“文革”中的这种做法予以批判揭露,力求使章太炎研究回到学术轨道上来。李泽厚亦发表《章太炎剖析》,对章太炎思想作了全面论述,认为“章太炎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许多见解,则是继章学诚‘六经皆史’著名学说后的最有成就者”^③。遗憾的是李文主旨不在此,故未对此点多加申论。另外,汤志钧编著出版了《章太炎年谱长编》^④,为章太炎研究的各个领域提供了最基本的背景材料,十分有益于学术史的探索。

①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生活书店 1947 年版,第 826、848 页。

② 唐振常:《论章太炎》,《历史研究》1978 年第 1 期。

③ 李泽厚:《章太炎剖析》,《历史研究》1978 年第 3 期;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87 页。

④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在台湾,林尹和张玉法分别为文对章太炎的学术成就予以研讨。林尹指出,章氏“对于清儒以汉学植名,薄魏晋之说而不道者,则尤矫正之不遗余力”。^①张玉法认为:“炳麟考察中国学术有两点是开风气的,其一是打破了一尊的束缚,把各家学术还诸各家的本身;其二是重视学术发展的客观环境,从地理、政俗等方面观察之。”“炳麟承乾嘉遗风,一面批评宋明理学,一面盛赞清初实学。惟以炳麟富反满思想,其论述清代学人,常以其是否反满为评价的标准,故最推许王夫之、顾亭林等人。另如能匡正宋明空虚学风的戴震、颜元等人,亦为炳麟所推许。”^②林、张二氏虽有此见解,但皆未深论,浮光掠影而已。日、美学者这一阶段也对章太炎有所研究,主题集中在章氏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上,如近藤邦康《章炳麟革命思想之形成——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③、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④、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⑤河田悌一《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⑥、麦克尔·加斯特(Michael Gasster)《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⑦、傅乐诗(Charlotte Furth)《独

① 林尹:《章炳麟之生平及其学术文章》,《孔孟月刊》第14卷第11期,1976年7月。

② 张玉法:《章炳麟的学术成就》,《章炳麟》,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载《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177、178页。

③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8册,1962年3月;载〔日〕近藤邦康:《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劲草书房1981年版;中译本为《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 〔日〕岛田虔次:《中国革命の先驱者たち》,筑摩书房1965年版。

⑤ 〔日〕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みすず书房1969年版。

⑥ 〔日〕河田悌一:《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の研究》,筑摩书房1978年版。

⑦ 〔美〕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行孤见的哲人——章炳麟的内在世界》^①等,也许因章氏学术文字过于古雅,不易索解,造成国外学者对其学术的探讨相对匮乏。

刘师培研究。由于刘师培一生作为的不光彩处以及政治、文化因素给研究者带来的影响,刘师培研究在这三人中是最薄弱的。这一阶段中国学者的著作仅张舜徽的《清代扬州学记》^②涉及刘师培的学术,但以介绍刘氏小学、经学、校勘学成就为主,对其清学史著述一笔带过而已。国外学者中美国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和日本河田悌一的研究最有代表性。马丁·伯纳尔的《刘师培与国粹运动》一文,^③是颇具研究深度的少数论文之一。它侧重探讨刘师培与国粹派的关联,认为刘的一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中政治革命与文化保守主义间尖锐不安的关系,并提示出刘氏某些思想的西方渊源及日本国粹思潮对中国国粹派形成的作用,但对刘氏学术则缺乏深入讨论,未能触及思想与学术的深层联系。河田悌一的《清末之戴震形象——以刘师培为例》^④评析了刘师培眼中的戴震形象,阐明刘氏何以推崇戴震以及这种推崇在清末所

① 〔美〕Charlotte Furth, *The Sage as Rebel: The Inner World of Chang Pingl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中译本见周婉窈译:《独行孤见的哲人——章炳麟的内在世界》,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0 年版。该文专有“语言与学术”一节,论及章太炎的小学、经学等,但未涉及其学术史贡献,在国外学者的论著中,这已是谈章氏学术较多的了。

②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③ 〔美〕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中译本见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

④ 〔日〕河田悌一:《清末の戴震像——劉師培の場合》,载《森三樹三郎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學論叢》,朋友书店 1979 年版。